



烟草输出

—向国外市场的渗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卫生规划署 1996 年 1 月份出版的《烟草与卫生：第一次全球状况报告》提供的数字，全世界有 47% 的男性和 12% 的女性吸烟。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的人达 3 百万，相当于每 10 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亡。预计这一数字在 2020 年会上升到 1 千万。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世界人口中，有 5 亿最后将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其中有一半人在中年就会死亡。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吸烟人口比例存在极大的差异。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烟草管理规划署负责人格雷戈里 N. 康诺利 (Gregory N. Connolly) 说：“在发达国家，男性和女性吸烟人口比例基本相同。但由于目前正处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的发病高峰期，吸烟人口比例正在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平均吸烟量很低，女性一般不吸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1990 年至 1992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香烟均消费量为每人每年 1,410 支香烟，而发达国家则为 2,590 支。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烟民往往在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发病前，已死于其它疾病。由于以上因素，发达国家由于吸烟相关疾病致死的人数占吸烟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发展中国家的 5 倍。牛津拉德克里夫医院 ICRF 癌症研究中心医学统计与流行病学教授理查德 - 皮托 (Richard Peto) 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卫生规划署研究员艾伦 D. 洛佩斯 (Alan D. Lopez) 在他们于 1994 年出版的《1950 - 2000 年期间发达国家的吸烟死亡率》一书中发表了上述统计数据。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戏剧性的转



变。在发展中国家，随着收入增加，人均吸烟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以前不吸烟的人群——包括女性和青少年——也开始吸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则开始戒烟。亚洲烟草控制公司执行懂事兼中国科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朱迪思 - 麦凯 (Judith Mackay) 说：“西方国家的香烟消费数量正以每年 1.1% 的速度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却以 2.1% 的速度上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达国家成人的平均香烟消费量要比发展中国家高 3.3 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一比值已经下降到 1.8。该报告称，“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在世纪之交后，发展中国家的香烟消费量很快就会超过发达国家。”麦凯认为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跨国烟草公司有计划地在发展中国家开发烟草市场的结果。“这些烟草公司预测 1991 年至 2000 年期间，他们在亚洲的销售增长为 33%。”

国际烟草制品市场的增长给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状况造成了令人吃惊的后果。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无烟少年中心特别项目组经理约翰 L. 布卢

姆 (John L. Bloom) 说：“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中国有 5 千万儿童将会在成年后死于由吸烟引起的疾病。中国市场向美国品牌香烟的开放，再加上美国公司采用广告诱惑及其老道的促销手段的影响，这一数字还会增加 5 百万。”布卢姆上述的评论是基于弗兰克 J. 查卢普卡 (Frank J. Chaloupka) 和阿迪特 - 莱克苏塞 (Adit Laixuthai) 发

表于 1996 年 4 月份的一项题为《美国贸易政策与亚洲的烟草消费》的研究。根据这项研究，美国烟草公司进入四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台湾、韩国、和泰国）后，将该地区的人均香烟消费水平提高了近 10%。如果美国烟草公司不进入的话，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达不到这一上涨水平。另外，吸烟量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会造成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及环境毒素暴露会加重吸烟和被动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全球烟草消费一览

中国：中国的香烟消费量冠全球之最。3 亿烟民的需求在中国造就了全球最大的香烟制造公司。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仅在中国，国营烟草公司的产烟量就占据了全球市场的 1/3，相当于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跨国烟草公司的总和。美国的烟草公司及跨国烟草公司通过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合资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另有大量美国及跨国公司的香烟被走私到中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

供的数字，进口香烟占中国市场的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国的香烟消费增长了260%，年人均消费量由730支增加到1,900支。皮托和洛佩斯的报告认为，中国每年死于由吸烟引起的疾病人数达50万。这一数字于2025年将达到200万。麦凯说，中国1995年按年龄划分的肺癌死亡率为每10万人，男性56.8，女性23.5。而这一数字在1985—1989年期间分别为49.3和20.6。美国1993年的统计数据为每10万人，男性死亡人数72.6，女性33.5。

东欧：尽管中国是最大的香烟消费国，波兰却以年人均3,620支的数字居全球人均香烟消费量之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数字为3,010。波兰男性和女性吸烟人数比例大致相当。女性有三分之一人吸烟，男性有二分之一人吸烟。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市非吸烟者权利协会法律顾问埃里克·勒格雷瑟利（Eric LeGresley）的说法，波兰及整个东欧地区的高吸烟率是共产主义体制的遗物。他认为这些政府“通过廉价的香烟给人民提供抚慰”。

根据皮托的统计，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引起的死亡占波兰总死亡人口的18%。男性与吸烟有关的死亡率从1955年占总死亡人口的9.3%上升到1995年的34%，而女性这一比例在1955年几乎为零，1995年则为7.2%。对于那些已经步入中年人口（35—69岁），20%的男性及2%的女性将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同在美国一样，与吸烟有关的死亡原因中，心血管疾病占第一位，其次是肺癌，其它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

从整体上看，前苏联的吸烟状况与波兰非常相似。根据皮托的统计，已步入中年的烟民中，一半男性及25%的女性活不到老年；其中，20%的男性及2%的女性将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自1955年以来，由于吸烟相关原因造成的中年男性死亡人数已增加了四倍。

总体上，通过死亡数字不难看出，东欧的烟民是最狂热的烟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匈牙利以年人均3,260支香烟的消费量排世界第三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匈牙利和波兰由于吸烟相关疾病造成的男性和女性死亡率均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则稍有下降。在波兰和前苏联，中年男性和女性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概率基本上和死于其它所有疾病概率的总和相当。

根据皮托的说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男性因吸烟过早死亡的机率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发

人均香烟消费量有可能被低估。

非吸烟者权利协会资深法律顾问戴维·斯韦诺（David Swenor）说：“亚洲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收入增长很快，使得原来烟民多但消费量低变为烟民多且消费量也高。南韩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也很贫穷，60—80%的男性可能吸烟，但也就是1天抽1—2支。现在，这一国家消费量很高，因为人们一天抽得起2包烟。”

在泰国，47%的男人吸烟。但妇女吸烟的比例只占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年人均消费量为810支。



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口达3百万，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亡。到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升至一千万。

发达国家的更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包括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一个35岁的男性，他在70岁之前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机率在20%左右。而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机率在40%左右。

东南亚：目前，东南亚44%的男性和4%的女性吸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年人均消费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850支增加到九十年代初期的1,230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东南亚八个国家的香烟消费量都在增加。在随后的十年中，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尼泊尔的消费量上升，南韩、泰国、斯里兰卡的消费量下降。然而，对于这一数字的下降亦应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在斯里兰卡，人们普遍吸比地（bidis），但未计入。比地是将少量烟丝（0.2—0.3克）卷入temburni叶子后，用细绳子捆住制成。尽管比地较小，但其产生的焦油及一氧化碳却和成品烟相当。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由于有些香烟是通过走私途径入境，成人的

但到八十年代初期就上涨到1,080支，并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在韩国，人均香烟消费量从1,050支上涨到1,210支，在八十年代初期又回落到960支。

拉丁美：根据时任美国公共卫生最高行政官（U. S. Surgeon General）安东尼娅·诺韦拉（Antonia Novella）于1992年发表的一份题为《美洲国家的吸烟与健康》的报告，吸烟每年在中美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造成将近10万人死亡。这10万人中，18,600人死于慢性障碍性血管疾病，18,500人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心脏病，17,000人死于脑血管疾病，13,000人死于肺癌。平均吸烟率为男性37%，女性20%，但具体数字变化很大，发达国家城区比例较高。

南美洲吸烟之都，委内瑞拉的年人均吸烟量稍有下降，为1,920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哥伦比亚的年人均香烟消费量也稍有下降，从1,880支降到1,750支。同期，阿根廷的消费量从1,810支降到1,610支。但是在墨西哥，消费量却从1,600支骤减至970支。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

学市场营销及商业环境学副教授 菲利普 L. 谢泼德 (Philip L. Shepherd) 的说法,这一下降部分是由于中美洲及南美洲的债务危机。谢泼德曾作为一名烟道烤烟推广人员在和平公司 (Peace Corps) 工作过三年半,后又与哥伦比亚及秘鲁国家烟草公司紧密合作。他说:“他们的吸烟量与收入直接相关。在他们出现债务危机及收入锐减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拉丁美

年 10 月 16 日在香港周刊杂志《窗口》上发表了他的看法:“想象中国的吸烟数字就像去想象太空的边际一样”。

康诺利在 1992 年的《国家癌症研究所期刊 - 单行本 #12》(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Monograph #12) 中撰文写道,进入一个保护性市场的典型策略“就是与当地烟草公司达成一系列生产协议”。

西方国家的香烟消费量正以每年 1.1% 的速度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正以 2.1% 的速度上升。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在世纪之交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量很快就会超过发达国家。



洲的香烟市场。”但是,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最高行政官的报告,在拉丁美洲人均吸烟量下降的同时,吸烟普及率却在上升,而且就发生在最近,其对死亡率的影响不容忽视。

非洲: 在非洲,广泛的贫穷使得人均消费量比世界其它地区要低得多。肯尼亚的年人均消费量为 500 支,且 20 年来鲜有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该洲的普及率大约为男性 25%,女性 1%,但同时也说明,非洲的数据“是以非常局限的信息为基础的,引用时应格外谨慎。”

逐步渗透

美国的烟草公司侵入海外市场所花的时间之长让谢泼德 (Shepherd) 感到吃惊。R. J. Reynolds 烟草公司 (RJR) 前总裁 Bowman Gray 于 1955 年发表的一番评论足以反映这些公司早期对海外市场兴趣的缺乏,“如果国外有人想要抽骆驼 (Camel) 牌香烟的话,让他跟我们联系好了,我们会给他弄些过去。”要在现在,这种狭隘的观念就意味着死路一条。目前,美国的烟草公司及跨国烟草公司正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因为现在海外市场的诱惑力是巨大的。Rothman (乐福门) 国际烟草公司烟草执行官伊比森 D. 乐福门 (Ibison D. Rothman) 1992

地方当局一般会接受这种一只脚迈进门的做法,因为使用的是当地的烟叶,并由当地企业生产。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跨国烟草公司向当地企业提供先进的农业技术

国际烟草公司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宣布他们将共同在中国生产并销售万宝路 (Marlboro),与此同时,开发并生产其它品牌,供国内销售及出口。RJR 及乐福门 (Rothman) 也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

海外销售

跨国烟草公司往往在敲开市场大门之前,广告已率先进场。1992 年 3 月 30 日 - 4 月 3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八届题为“烟草与健康:建立一个无烟的世界”的会议,这次会议撰写的一组专题为《阻止烟草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文件明确提到:在泰国,作为一种惯常的做法,‘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为一些不能合法销售的品牌树起了大型广告牌’。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泰国、法国和波兰,都禁止或限制香烟广告。而禁烟人士则指控烟草公司采用各种伎俩来避开这些禁令。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律师协会烟草项目组副主任卡伦 - 刘易斯 (Karen Lewis) 说:“Joe Camel 这个卡通人物就是为了巧妙地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国的香烟消费量增长了 280%。中国每年死于由吸烟引起的疾病人数达 50 万。这一数字于 2025 年将达到 200 万。“中国的吸烟人激励着太空的星星。”

- Ibison D. Rothman

烟草执行官

和生产技术。康诺利说,与此同时,跨国烟草公司 (TTCs) 迫使当地政府放弃对本地烟草市场垄断管制。在为将来的市场占领打下了基础。

截至 1995 年, TTCs 在东欧完全买下了三十多家前国有烟草公司。向东欧市场的迅速渗透可以从 RJR Nabisco (原 R. J. Reynolds 烟草公司) 的国际销售情况反映出来。“在市场开放之前,RJR 在这一地区的销售量很少。但到 1993 年,东欧占了 RJR 国际销售量的 23%,高于亚洲(18%) 或中东和非洲(18%)。

1993 年 8 月 16 日, Philip Morris

绕过法国政府关于‘禁止采用活体模特将香烟与充满活力、性感、健康联系在一起’的禁令”。位于瑞士日内瓦 R. J. Reynolds 国际烟草公司的外联主任亚当 - 布雷恩 - 布朗 (Adam Bryan - Brown) 也承认 Joe Camel 1974 年为打开法国市场进行的宣传活动而设计的,但避而不谈那次活动的详细内容。

尽管烟草的广告在法国已被禁止,但“巴黎有一个儿童赛车比赛,汽车上贴有香烟商标,一个万宝路 (Marlboro),一个云斯顿 (Winston)”。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亨利福特健康促进及疾病预防中心主任罗纳德·戴维斯（Ronald Davis）说，此外，法国的商店还出售骆驼（Camel）牌服装。

布雷恩·布朗承认确实存在骆驼牌服装、旅行包、纪念表、以及其它高档装饰品，但他力陈品牌多元化是许多行业做法。麦凯说：“目前亚洲也有此类产品，以及万宝路精品店”。

勒格雷斯利说，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烟草公司正积极反抗一系列禁令。通常，他们的理由是“这些禁令否定了言论自由，并导致广告收入的损失”。勒格雷斯利认为，烟草公司所有这些辩解都是建立在几个他们不愿验证的假设上。他们假定言论自由也适用于企业团体。他说：“从国际法来看，显然是不适用的”，并援引一份1996年的联合国基本人权公约《人权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予以证实。根据该公约，言论自由不受种族、信仰、出生地的影响——所有这些特质都是企业集团不具备的。

勒格雷斯利说，只要一有可能，烟草公司就会集中精力去影响外国政府的烟草政策，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说服少数几个立场本来就不坚定的政客接受他们的观点。”但要对所提议的政策法规进行表态时，他们会等到最后，甚至等过了表态期，再向当局抛出一大堆的看法。勒格雷斯利还拿加拿大和南非的例子进行引证。

50%。这些条例包括，不得派发免费香烟样品，不得销售或免费派发带有烟草制品名称或标识的服装，以及不得用品牌名称代替公司名称赞助体育及娱乐活动；禁止在学校及运动场1,000英尺范围内做广告；以及规定读者对象中18岁以下人士超过15%（或2百万）的出版物只能以黑白文

墨。他们与哥伦比亚当地的烟草公司合作来侵占他们的市场。他说：“走私网络的效率令人难以置信。在南美许多地区，本地烟草公司很快萎缩，并被收购。”布雷恩·布朗说高税收是造成当前走私猖獗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在任何时候采取高价或限制措施都会

截止1993年，东欧占国际香烟销售量的23%，高于亚洲、中东、或非洲。

字形式刊登香烟广告的条例。在另一条例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向青少年销售数量较大的六家烟草公司要针对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在青少年中开展教育。

走私

有些观察家指出，跨国公司并不限于以合作和广告形式直接公开地进行市场渗透。斯韦诺说，有1/3的出口香烟通过走私渠道运出。由于数量太大，除了这些公司直接参与，很难有其它解释。斯韦诺说：“如果IBM说，‘我们出口了3百万台计算机，但只知道其中2百万台的去向’，他们肯定被人笑话。”

引起走私。这并不一定非要公司亲自操作。”

麦凯说：“目前尚没有人敢明确指控烟草公司进行香烟走私，除非有绝对证据。否则，这么做就是诽谤，且相当危险。”麦凯引用了NatWest证券公司于1995年对烟草公司投资者的分析数据。该分析对如此大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占全球香烟出口的30%）的出口烟草的失踪提出了疑问。唯一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的是美国布郎&威廉姆逊烟草公司（B&W）的母公司——英美烟草公司（BAT）。但报告指出：“英美烟草公司向中国合法出口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能够通过非正式渠道抵达中国市场，大多数是通过香港，所以对其销售量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华尔街日报》1996年12月18日的一篇文章声称从三位原英美烟草公司执行官处得知“英美烟草香港分公司每周召开例会讨论走私事宜，细到具体船只、卸货港口、以及组织销售的村庄”，且“将此类信息对从伦敦访问亚洲的英美烟草公司最高层官员保密，以便他们对此进行否认”。英美烟草公司对该文章的指控予以否认。

最近的两起案子对烟草公司是否涉嫌走私香烟进一步提出了疑问。1995年原B&W公司出口部经理廖金雄（音译，又名Jerry Lui）被关押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等待引渡到香港审判，当时对他的指控是接受香港走私者的贿赂。这伙香烟走私者在1984—1993年期间，从香港运入中国

有1/3的出口香烟通过走私的地下渠道运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造成烟草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竟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市场不断加强对烟草制品的限制以抑制销售量，特别是对儿童的销售。1996年8月23日，克林顿总统批准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制定的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将青少年吸烟量降低

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总计价值 12 亿美元。1997 年 1 月，美国首席地方法官约瑟夫 L. 陶洛 (Joseph L. Tauro) 作出判决，考虑到香港即将回归中国，廖向香港的引渡可视为对等执行向中国引渡。由于美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廖被释放。

1996 年五月，B&W 东海岸地区经理米歇尔 - 伯恩斯坦 (Michael Bernstein) 以及一位原 B&W 员工被起诉协助从美国向加拿大走私违禁香烟。美国路易斯安纳州东部地区检查长埃迪 J. 乔丹 (Eddie J. Jordan, Jr.) 在公开这一宣判后接受《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采访时说：“我不知道该公司在策划走私。如果这种例子很多，公司又不予以过问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英美烟草公司拒绝就该问题向《环境与健康展望》发表看法。布雷恩 - 布朗声称：“我们不走私，也不支持走私。”但是，他补充说：“走私是不易改变的现实问题。不光是香烟，其它许多消费产品也存在走私。”

贸易政策与卫生政策

康诺利指出，“美国政府敲开封闭市场的另一个策略就是用贸易报复进行威胁。”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

销的种种限制提出抱怨之后。尤特同时还向韩国和台湾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允许在电视上进行香烟广告，而这是在美国是禁止的。除泰国之外，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在开放市场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台湾和韩国拒绝开放电视广告，但默许印刷广告。

泰国对美国贸易制裁的成功抵制是由于泰国和美国两方面民间游说团体的努力。他们的努力终于促成了第一次公开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美国公共卫生最高行政官埃弗雷特 - 库普 (C. Everett Koop) 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强烈抨击。他说：“我们一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停止出售可卡因，一方面却又出口烟草，这分明是伪君子的做法。”

1989 年 12 月，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之下，尤特将此事提交设在日本内瓦的负责解决与关贸总协定 (GATT) 相关的纠纷的一个委员会。大多数国际贸易都由该委员会仲裁。1990 年秋，该委员会裁定：“吸烟对人类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危害，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香烟消费量符合公约 XX(b) 款”，是保护健康的必要措施。关贸总协定允许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香烟的销售量，包括禁止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进行广告及促销，只能采用普通包装，限制标签内容，标明成分等，只要这些

所允许的。

克林顿政府早期，商务部和卫生部成立了一个联合专家小组对烟草贸易政策进行审查。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说：“这次审查达成了一项原则，即美国政府不得反对别国政府采用合法卫生条例保护其公民健康。”该官员还说，该小组认为那些专门歧视美国的贸易限制也应得到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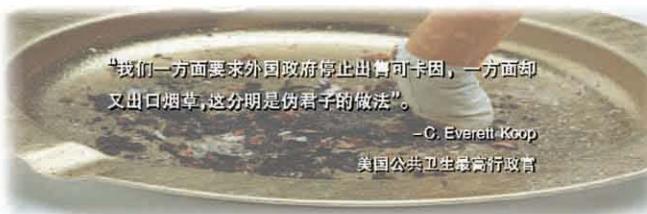
1996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吸烟与健康科主任米歇尔 - 埃里克森 (Michael Eriksen) 首次应邀出席和几个亚洲国家进行的烟草贸易谈判。埃里克森说，“和台湾和南韩的谈判我都参加了。两次谈判中，我了解到有关烟草与健康问题及贸易中存在的对美国产品歧视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采取强制措施在已禁止香烟广告的国家进行广告的情况相比有很大改观……此次的策略是只要不是以专门歧视美国香烟的方式出现，对南韩提出的烟草控制措施应予以支持。”

布卢姆说，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以及其它烟草制品生产及出口国都曾给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它多国卫生组织施加过压力，允许跨国烟草公司继续其广告及销售。他还说：“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禁烟人士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强迫其它国家放松对香烟广告及销售的限制，而美国对内对外政策却不敢鼓励吸烟并提供医疗保健援助，这两个政策之间相互矛盾。布卢姆说，“根据我们的看法，美国政府在解决其它流行病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结核病、疟疾等等，都有可能被吸烟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所抵消。”

在 Philip Morris 国际烟草公司，钱的问题是不公开的。但是，根据官方报纸《中国日报》1996 年的一份报告，该公司在中国的香烟年销售额为 36 亿美元，不到与吸烟相关疾病所花的医疗费，人口死亡造成劳动力丧失及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损失总数 78 亿美元的一半。

但在最近的一次亚太烟草控制协会会议上，据中国科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金水高 (音译) 提供的数字，1993 年中国因吸烟造成的直接损失为 18.5 亿美元，比《中国日报》提



年代后期不相关的三起事件中，应当时的美国香烟出口协会（现已不存在）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 - 尤特 (Clayton Yeutter) 提出，如果台湾、泰国、韩国及日本不允许美国烟草公司自由进入他们的市场，那么，美国也将根据 1974 年贸易法案第 301 章，对这些国家出口到美国的货物进行制裁。这些都发生在美国烟草公司对配额、关税、以及对广告和营

措施对国内国外的品牌一视同仁。

根据 1995 年的记载，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顾问 David R. Moran 曾与日本使馆经济顾问 Taro Ishibashi 以及英国使馆经济顾问理查德 - 费尔 (Richard Fell) 试图给泰国烟草管理局主任 Varabhorn Bhumiswadi 施加压力，要求他与烟草公司执行官们进行谈判，撤消公开香烟成分的要求。而要求公开香烟成分是关贸总协定

供的数字要小得多。直接损失包括直接医疗费用以及吸烟引发火灾造成的损失，但不包括由于过早死亡造成的劳动力丧失的损失。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美国对外政策在推进烟草制品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阻止。但其在促销上所花费用远远高于在阻止上所花费用，就更用不着去谈花在包括与吸烟相关疾病的对外援助医疗的费用了。

例如，根据美国政府会计局提供的数字，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美国缴纳的会费几乎占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的 25%。该经费中有一部分是用于世界卫生组织所开展的阻止香烟销售及加强人们对吸烟会危害健康的认识的全球计划上的。1990—1991 年度，世界卫生组织用于反对吸烟计划的经费是 120 万美元。

另外，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合作协议，向包括健康信息传播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提供资金。据史蒂文·沃森（Steven Watson）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吸烟与健康处是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烟草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中心。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正在和泛美卫生组织进行合作。

新闻官员利厄·莱文（Leah Levin）指出，美国国际发展署在国际性健康计划上花费了 6 亿多美元，包括儿童救援行动，孕妇健康、疾病教育及预防，以及一些一般的健康活动。但是，她说：“我相信那些活动中，没有一项是专门针对反对吸烟的。”

把 烟 扔 灭

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各种阻止吸烟的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之一是《世界烟草汇编》（*World Tobacco File*），它可靠地反映了世界烟草行业市场情况。根据《汇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阻止吸烟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对香烟征税。

1990 年，英国开始将香烟税在每年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提高至少 3%，此后，人均香烟消费量下降了 20%。新西兰由于税收提高，香烟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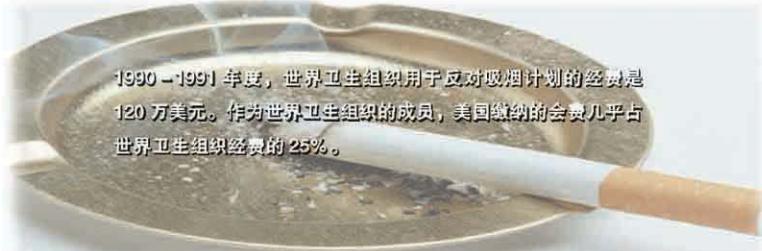
格上涨了 50%，在随后的两年内，消费量下降了 20%。

戴维斯说：“研究显示，香烟价格每上涨 10%，销售量就会下降 4%。”一些研究显示，在青少年及社会经济状态较低的阶层中，价格弹性（消费随价格变化的变化而变化）要大得多。

斯韦诺说，在加拿大，由于税收原因，香烟价格猛涨了 150% 还多，“迫使青少年人均吸烟量下降了 40%。”青少年之所以放弃吸烟，是因

告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实施广告禁令是非常重要的。香烟广告会给他们造成吸烟是被社会所接受的概念。”

如果说香烟广告及香烟广告禁令的作用还有待争议的话，那么，美国贸易政策支持下的烟草公司对政治及经济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斯图尔特的报告，这一发现与市场竞争加剧会降低这些国家的香烟价格的期望是一致的，且与美国烟草公司投入数百万美元进行营销活动已造成消费量增长的事实也是一致的。康



1990—1991 年度，世界卫生组织用于反对吸烟计划的经费是 120 万美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美国缴纳的会费几乎占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的 25%。

为他们必须在吸烟与其它消费之间进行选择。

根据《汇编》，在发达国家，政府立法对香烟包装作出规定以及禁止在公众场所吸烟是限制吸烟的第二个最有力的手段。在七项措施中，对广告及营销的限制则排在第三位。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措施则排在第五位。

但是，观察家们对禁止香烟广告这一措施的作用表示异议。广告顾问米歇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在对 22 个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OECD）烟草消费量进行调查时发现，在实施广告禁令之后，烟草消费量出现了小幅上扬。斯图尔特说：“这一增长幅度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很显然驳斥了禁止香烟广告会明显降低消费量这一观念。”这份调查报告发表在 1993 年的《国际广告杂志》上。截止 1990 年，被调查的 22 个国家中已有 6 个实施了广告禁令。在《国际广告杂志》1996 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曼切斯特大学的马丁·达菲（Martyn Duffy）发现“支持禁止香烟广告可有效降低消费量这一观念的证据并不是很有份量。”但是戴维·斯韦诺对此表示反对：“考虑到广

诺利在该报告中阐述：“如果考虑到吸烟对健康的极大危害，贸易的自由极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国家与吸烟相关疾病及死亡率的增加。”

过去，由于低收入及国有烟草垄断企业采用本地劣质烟叶生产的香烟口味不佳的原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烟草需求。康诺利指出：“由于缺乏竞争，一般没有香烟广告……然而，这种由于市场推广缺乏效率所造成的对吸烟的抑制却有可能对公众健康产生意想不到的好处。”而现在，一切都在改变。

美国的烟草公司及跨国烟草公司正用现代化的广告及比本土产的香烟更柔和、更醇、包装更精美的产品来引诱发展中国家的不吸烟人口。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收入也使得烟民们可以放纵他们的喜好。根据皮托的说法，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下一个世纪，发展中国家与吸烟相关的死亡人数将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

- David C. Holzman

译自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05: 178—183 (1997)